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人民日报理论部 举办抗日战争史学术 讨论会综述

在近代中国历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唯有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人民日报理论部于 5 月 10—11 日联合举办学术座谈讨论会,邀请在京的部分抗战史学者参加。出席会议的 27 位学者就抗战史研究中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一、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

与会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作了深刻阐发。

王桧林、肖一平等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可概括为:它是中国反帝斗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时期;是爱国主义精神空前高涨的时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由劣势向优势转化的过程,抗日战争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范例;是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是中国以大国、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同外部密切联系的时期。张振鹏从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目标论及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他说:1938 年,蒋介石提出的抗战目标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1940 年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1943 年在开罗会议上又正式提出收复东北和台湾。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基本实现了上述目标。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抵抗日本侵略的胜利,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

与会的学者中,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肖一平、陈廉,

深情回忆了当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历和感受；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的政策是，经济上公私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政治上反对一党专政，实行“三三制”政权；思想作风上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联系群众，一般干部战士可以当面对领导干部提出批评意见。这些好的政策、经验和传统，对今天仍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二、局部抗战时期

有些学者论及局部抗战阶段的问题。何仲山认为：研究抗日战争，只提八年抗战还不够，必须对“九一八”至“七七”期间的局部抗战进行全面研究才比较完整。局部抗战为全面抗战作了准备，政治上为国共合作作了准备，思想上为唤醒民族觉醒作了准备，军事上国共双方也作了准备。

金再及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八一宣言》发表前，尽管中共在反击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也主张武装抗日，但这不能说明中共此时已实现了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中共提出“抗日反蒋”，将反蒋置于第一位，而且，反蒋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进攻性的。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中共当时仍坚持阶级矛盾高于民族矛盾，坚持苏维埃革命的方针。直到《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后，中共才逐步实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转变。

三、抗日战争中的两个战场

许多学者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发表了见解。

马仲廉对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两军协同作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战中既有战略配合，又有战役配合。战略配合贯穿于抗战全过程；战役配合主要集中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特别是在忻口战役中尤为突出。国共将领共同制订了作战计划。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朱德指挥过阎锡山的10个团作战。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也曾归属于晋军指挥作战。战役后期，阎锡山提出的由晋军和八路军共同开辟敌后游击战场的建议，得到了毛泽

东的热情称颂。

袁旭、杨圣清认为过去对正面战场研究不够，对正面战场的评价较低，但现在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杨圣清说：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应将抗战初期同中、后期的情况加以区别；对国民政府决策指挥的失误与广大官兵的爱国精神加以区别；对各次战役和各参战部队加以区别。刘敬坤则认为：由于国共合作，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作战的局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哪一方面的研究都不容忽视。

韩信夫提出，国民党对日作战，既包括正面战场，也包括敌后游击战场。他论述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过程和豫东北、山西、浙西、豫鄂皖边区及海南岛等国民党军队游击区的概况；徐焰认为，国民党在敌后虽有游击队，但绝大多数没能坚持下来，没有形成战略意义上的游击战场。

抗战史论著一般均认为：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阻止了日军的“北进”，推迟了日军的“南进”。徐勇则认为，日本始终没有形成“北进”政策。张鼓峰、诺门坎事件是日苏为争夺中国领土而发生的边界冲突。徐焰认为，张鼓峰事件恐不能看作争夺领土引起的冲突，而是日本对苏联的战略试探。讨论中学者们认为，日本的“南进”方针是它在中国战场陷入困境后，为尽快解决对华战争而确定的。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一方面加紧对中国的武力进攻，另一方面不断对中国进行外交诱降活动。国民政府也未拒绝与日本的接触，过去往往将这视为蒋介石妥协投降活动。丁则勤分析指出，抗战初期中日双方没有议和的可能，因为中日双方各自的要求都是对方所不能接受的。日本一切议“和”的“目的”，都要彻底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蒋介石接受议“和”的目的，是想牵制日军的进攻，他提出的议和条件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实际上是要求日本放弃侵华战争的战果，这是日本绝对不能接受的。蔡德金认为，如

何评价重庆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坚持抗战，还是力图妥协，仍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应该看到，中国的抗战是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形势下，被迫起而应战的；抗战过程中所有的“和平”攻势都是日本发动的，结果都是由于重庆国民政府的拒绝，日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这便是战时中国对日政治外交斗争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刘存宽对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作出评价。他认为，尽管该条约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对中国来说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由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中间背着中国秘密商定的，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苏联以战后不支持中共为条件骗取国民政府同意外蒙独立等条件。它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长远的消极影响。

罗焕章分析到，中共为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早在抗战前，中共即已提出这一政策。1937年3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中、英、美、法、苏应建立联合阵线，并在太平洋建立反日统一战线。

五、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文化

李学通认为，目前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的研究很不充分，对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应作出客观评价。他说，造成1942年以后大后方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滑坡的原因，虽然不排除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经济统制政策以及官营工业的扩张作用，但1942年初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使大后方几乎处于完全被封锁状态，这才是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是战时国民政府最具实质意义，效果最显著的经济措施。它不仅使军需民食得到切实保障，也起到调节市场，稳定物价的作用，为抗战提供了最坚实可靠的基础。大后方农民也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

王桧林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时期。这一论断早在战时即有人提出。当时许多文化人认为，中国的复兴是学术上的复兴，其核心是儒家

文化的复兴,由此引起了抗战中后期一场有关文化复古与文化复兴的讨论。他认为,源于抗战时期的新儒学思想在当前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这一问题值得学术界的重视。

六、侵华日军暴行和中国抗战中的损失

章伯锋、齐福霖等人论述了中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以及中国人民遭受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齐福霖分析侵华日军暴行产生的根源在于:从根本上说,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所决定的。战前日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灌输军国主义教育,宣扬武士道精神。因此,日军屠杀中国人民极端残忍,灭绝人性,以刺杀中国人练兵练胆,用中国人活体做细菌试验。日本是一个最歧视女性的国家,因此建立军妓制度,奸污蹂躏中国妇女,罪行极为严重。章伯锋提出,对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的数字、财产损失等,应认真调查研究,加以充分论证。他们认为,必须加强日军暴行的研究,批驳日本那些否认侵华暴行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谬论,教育中日两国青年。

七、日本为何不能坦诚反省战争

林治波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日两国进行比较,指出与德国不同,日本始终不能坦诚反省战争,主要是由于战后日本没有废除天皇制,经济上未进行战争赔偿,盟国对战犯审判不彻底。加之日本民族存有排外狭隘的岛国心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产生了傲慢心理,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其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真相的揭露。老的一代不认错,新的一代不了解,这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社会反省战争的困难。胡哲峰强调:我们应加强抗战史研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

八、进一步深入抗日战争史研究

与会学者们认为,近十多年来史学界已开始重视抗战史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领域尚待深入,要树立全民族抗战这样一个总的观点。何理认为,不能仅仅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领导权、两个战场这样一些问题,要拓宽研究领域,加强抗日战争

时期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从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个视角综合研究。杨奎松认为,抗战史研究中,过去只阐发抗战中积极方面的经验,如作深入研究,也应对一些历史教训,例如民族内部不团结等进行总结。王树荫认为,在抗战史研究中,应考虑如何将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统一起来。肖一平认为:应加强专题研究,同时要组织编写一部具有科学性的抗日战争通史。张注洪认为,研究抗日战争史应关注台湾、香港和国外的研究状况。他分析了海外学者有关中国抗战史研究状况,认为:美国的研究成果数量虽不多,但影响最大;前苏联的研究状况比较滞后,且意识形态色彩极浓,苏联解体后,这一领域几乎无人涉足;日本自 50 年代后,开始广泛深入地展开研究,成果最丰富,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相当大一部分著述不能正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

(以林)

中国史学会举行纪念抗战胜利 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1995 年 7 月 5 日,中国史学会五届二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余位史学会理事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致开幕词,他回顾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巨大历史灾难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后,指出:“抗日战争的深刻教训是霸权不可能得逞。半个世纪以前,德国、意大利、日本依靠精锐的武器和军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侵略蹂躏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在人民的团结战斗下,法西斯主义终于得到了可耻失败的下场。”